

ZHONGHUAMINGGUOSHICONGSHU



中华民国史丛书



在国民党中地位显赫的何应钦，人称“何婆婆”。这个来自贵州穷困地区的少年，是怎样走出贵州，一步步发迹的？他在蒋介石众多的文臣武将中，居于什么地位？他富贵荣宠的一生中，虽几经沉浮，但均有惊无险，是怎么度过来的？本书系统介绍了何应钦的一生，公正评价了他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对“何梅协定”和“西安事变”的何应钦，提出了颇有新意的独到看法。

# 何应钦的宦海沉浮

熊宗仁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zhonghua.minguoshicongshu



中华民国史丛书

顾问：

李 新 孙思白 陈旭麓  
胡 华 彭 明

主 编：

张宪文 黄美真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学庄 方庆秋 毛 磊  
史金生 李静之 杨凤阁  
金普霖 段云章 张文惠  
张虎文 郭增印 徐辉琪  
黄美真 蒋相炎 靳德行

# 何应钦的宦海沉浮

熊宗仁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K825.2

21-1

1

(豫)新登字01号

### 何应钦的宦海沉浮

熊宗仁著 责任编辑 张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邙山书刊商标装潢厂印刷

---

新华书店经销

805×1168毫米 32开本 11.625印张 267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7-215-02372-9/K·387

定价11.80元

131824

## 编辑说明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华民国史，是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号召编修中华民国史和重修清史。一九五六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被列入重点项目。一九八三年，邓颖超在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研究中华民国史的重要性。

开展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胜利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权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也可以使广大群众深刻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曲折过程，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提高建设祖国、实现四化的信心和决心。

本《丛书》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对中华民国史研究活动的广泛开展起促进作用，并能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民国史知识。

本《丛书》拟通过较系统地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事件和专题，全面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它收录的范围，从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覆亡止。

FV40/08

131824

本《丛书》要求史料翔实可靠，观点正确，文笔流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恰当分析和评价。

本《丛书》从一九八七年开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中华民国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7年11月

## 前 言

何应钦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曝光也多，隐秘也多，而对其研究又有待深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之被视为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的第二号军事首脑、国民党陆军的“保姆”、亲日派的巨头、反共顽固派、罪魁祸首之一，正说明他在中国现代史、中日关系史、国共两党关系史以及国民党党史、国民党军军史上，都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由于他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足迹横跨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三个苍黄翻覆的历史时代，其间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其相伴生的政治风云波澜起伏，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分合散聚，仇友互易，因而使何应钦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历史活动的轨迹并非简单的一条直线或曲线，让人一目了然，有时竟然会是一种走向相反、自相矛盾的双曲线。这双曲线有主有次、有明有暗，但要准确无误地在研究中表现出来，确非易事。此何应钦研究之一难。

长期以来，我们受“左”的思想影响，不敢或不愿正视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的错综复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流毒影响下，几乎只以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来代替对个别历史人物多角度、多侧面的立体研究，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像何应钦这样恶名昭著、劣迹累累的人物，说他坏，他果真坏，不坏也坏。

那自然无所顾忌；而要说他曾经并不很坏，坏中也曾有过的表现，即使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时，也得区分那“罪大”和“恶极”的“度”及其当时的历史条件，那就需要点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了。此何应钦研究之二难。

建国以来，海峡两岸有30年几乎绝对隔绝，史料相互封锁，观点更难沟通。在史学研究中，特别是涉及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中，双方都不同程度地有相互否定和过分情绪化的缺憾，研究者纵然有尊重历史的主观愿望，亦难冲破这种用现实需要代替历史事实的客观氛围。所谓“秉笔直书”，至多能做到“写的必须真实，真实的不一一定要写”。禁之广，讳之多，海峡两岸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有所体验。此何应钦研究之三难。

何应钦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作为一个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之一，而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本身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全体，他具有国民党反动派本身的共性，有一切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本质特征，但他是他，有其个性，有其反映和表现其阶级共性和本质特征的异于他人的地方。况且，上面所说的只是何应钦一生历史的主体部分，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但何应钦未走上反共道路前的那段历史，难道可以不研究？何应钦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祸首，但也直接或间接、被迫或主动地做过一些对抗日有利的事情，难道可以置之不顾？到台湾以后，他也提出过一些有利于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并得以付诸实施，当然也不能一概否定。何应钦的个性特点、生活作风和待人接物上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也是构成他军事、政治历史活动不可或缺的因素。研究历史人物固然必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去把握其本质和主流，但如果离开个性特征及其形成的特殊历史环境，

乃至许多偶然性的因素，那这一个历史人物便可简单地归结为某种模式或与哪一个历史人物雷同，而不是他本人了。如何把握这种共性、本质及表现这种共性、本质的特殊个性，构成了何应钦研究之四难。

此外，何应钦一生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一些似已定论而实际上大可争议的十分敏感的问题，诸如西安事变中何应钦主战之动机是否有取蒋而代之的因素？《何梅协定》的有无之争等等，似乎有口皆碑，经典明示。但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对原来的定论势必要提出质疑。于是，便可能有为反动人物“翻案”之嫌，难为某些以“左”的惯性思维者所容忍。诚如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巡重要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此何应钦研究之五难。

有上述五难，已足令我如履薄冰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历史研究本身就是科学研究，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达到某种目的去歪曲历史，去迎合某种时尚，去趋奉某些利用权势压人者的并非正确的意见，本身就丧失了作为史学工作者起码的政治立场和学术道德。

何应钦是一个以其军事、政治活动给中国历史留下阴影的人物，研究何应钦的重点自然应摆在这里，评价何应钦的功罪是非的重点也在这里。这是勿庸讳言的。但研究何应钦、评价何应钦并不能仅止于此，还必须兼顾其他方方面面。研究和评价何应钦，如何使政治标准（包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包含某一历史时期的政策、策略）、历史标准（包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也包含用历史发展的眼光，



从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察其历史活动的客观后果)、道德标准(包含传统的道德标准、历史人物所处时代及其所属群体的道德标准、当代的道德标准,也包含不同作者所依奉的特定阶级的道德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既必要,也确有难度。无论我怎么努力,囿于资料、水平、才识和勇气,写出来的何应钦都与历史上真实的何应钦仍有很大差距,与我所尽力遵循的上述原则,都有许多相悖之处。

为使读者了解我写作此书的基本思路,不得不把已经问世的《何应钦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内部发行〉版)的前言有关部分改造、移植于此,既示某种承袭之意,又执我行我素之见。

在何应钦一生影响重大的历史活动中,他塑造自己形象的材料,可概括为一条主线、两对矛盾,即反共的主线,依附性与权势欲之间的矛盾、对社会及官场的普遍适应性与他个人生活作风、个性品格之间的矛盾。

何应钦对中国历史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恰恰始于他追随蒋介石参加国民革命而又背叛了国民革命。从1926年他支持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到1987年他逝世为止,其历史活动的主线都是反共,而且态度之坚决、立场之顽固、活动之频繁、影响之恶劣,在国民党反共的充充诸公中也堪称一流。

在黄埔军校后期,他是或明或暗站在反共势力一边。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他是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反共事件的积极支持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他先事发难,积极配合。他直接指挥和参与指挥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对湘、赣、闽地区红军的镇压。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是国民党当权集团“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忠实而积极的执行者。抗日战争中,以制造皖南事变为顶

峰，表明了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积极反共的立场。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他最突出的反共“功绩”，是破坏国共和谈和一度参与指挥国民党军负隅顽抗。去台以后，他在台湾和国际间所殚心竭虑的一切，几乎都与反共息息相关。

要深入研究何应钦历史活动中这条反共主线，不能不同时研究他的对日观的形成和发展变化。

何应钦一度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中亲日派的巨头。他的对日观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除他有留学日本的经验、青年时代就向往日本的近代化和崇拜武士道精神的历史渊源外，也受到当时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影响，最主要的是蒋介石选中了他作为自己处理对日关系的代理人，或者把他的亲日活动作为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向英美集团讨价还价的筹码。何应钦留学日本时，对日本保有的中国儒家文化就有强烈的认同感，并因能留学东洋奠定日后步步高升的基础而深铭肺腑。但他的留日与亲日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纵观何应钦对日观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不难发现，他的反共和亲日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因果联系。但他不是因亲日才反共，倒是为了反共而亲日。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受降和遣返，其间除以汪精卫集团为代表的汉奸卖国贼公开投敌外，何应钦始终是国民党内妥协、亲日暗潮的代表人物。但他不是决策者，只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执行者。当然，有时他也是主要的决策者之一。“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他积极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路线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抗战胜利后又是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怨报德，对日本侵略者“以德报怨”、联日反共计划的主要实施者。

去台以后，他是台日条约的重要牵线人。他曾积极拼凑“东北亚反共联盟”，妄图依靠日本右翼势力，实现“反共抗俄”的梦想。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他却又对日本朝野有助于改善日中关系的一切努力，对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大肆抨击，俨然又成了台湾岛上“反日”的带头人。其前后表现虽异，但实质一样。何应钦对日观的主旨，既有感情、立场、功利方面的因素，也有国共两党政治、军事斗争中的策略需要，这将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更加明晰。

综观何应钦的一生，他大量的反共、亲日活动的主观动机，自然源于其阶级本质，但除了私欲、情感和国民党当权集团对他的影响外，还应该承认，何应钦也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独立、自由、富强、繁荣的。尽管他因反共和抗日战争前后的亲日妥协而负罪于历史，但他一生中也曾有过光荣的经历和闪光的思想点，有他作为炎黄子孙的爱国传统及重要历史人物丰富多采的另一侧面。

在辛亥革命中，他曾经是一个爱国者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一定程度的拥护者。在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折前后，他表现了较强烈的反帝爱国热情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的渴求，是贵州新文化运动向群众爱国实践运动转化过程中虽不彻底但却积极的鼓吹者，是“五四”时期贵州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动者之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对黄埔军校的教练工作和革命军的创建尽了力，对广东革命基地的巩固也不无功劳，特别是两次东征中确有战功。在革命的三民主义影响下，在高涨的革命洪流中，他也曾激荡起反帝反军阀的热情。在北伐战争中，虽有投机取巧之嫌，但确实不乏战绩。

何应钦自1930年就任军政部长以后，直到1944年冬卸任，历

时近15载。以中国之大，积弱不振，加以新老军阀长期混战，他主持军政所遇到的困难，的确为世界主持军政者所罕见。他对国民党军的建设，对中华民国军制、兵制的完善及国防力量的加强，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等，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虽然亲日，但毕竟没有脱离中华民族神圣抗战的营垒，与汪精卫之流公然投敌的汉奸卖国贼不应等量齐观。

去台以后，何应钦在“反共复国”的主旨下，对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提出过一些积极的建议，进行过一些努力。特别是他始终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及“一中一台”的阴谋。虽然他顽固地坚持极不现实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强调中国应该统一，却是与后来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前提相吻合的，也是为所有炎黄子孙所欢迎的。

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中，何应钦长期把反共作为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并为之宣传鼓动、践履笃行。何应钦始终标榜自己是“爱国”者，但他与真正爱国并且能救国的中国共产党人却不共戴天。实践已经证明，一切真正的爱国者，他真诚的爱国动机，必须同他所选择的爱国、救国道路是统一的。诚然，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上一切有爱国心的人所选择的爱国方式和救国之路，都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一致。但是，何应钦所标榜的“爱国”，同他顽固坚持的反共立场，历史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是一条民族自弱自戕的绝路，而他却至死未悔。何应钦所为之拼命的这条道路，延缓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使历史倒退；在抗日战争中，它削弱了抗日的力量，使国共两党和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付出了不应付出的过大的代价。

国共之间的战争早已结束，一切爱国者都希望结束两党的对

峙，使祖国尽快统一、富强。但何应钦生前囿于一党之私及个人之利，不肯放弃早被实践证明既违背时代，也违背人心的反共的政治信仰。把“爱国”等同于反共，这是他个人及同类人物的最大悲剧，也是国民党制造的我们民族在本世纪的一大悲剧。

制造历史悲剧的人物，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结束历史悲剧的人物，终将成为历史上的英雄。

何应钦对权势的依附性和他的权势欲之间的矛盾，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在他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上。

他处理何蒋关系以求得利禄权位和求得心理平衡之术，不唯一般人困惑，就连国民党官场中人也称玄道妙。何蒋关系，虽有波折和断裂，却能善始善终，还延续及蒋介石的继承人蒋经国。这除了蒋介石的治人驭势之术使何应钦畏服外，起决定作用的主观因素，是何应钦对权势的崇拜和依附。

权力崇拜，是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在何应钦身上所形成的自主意识与非自主意识凝聚的深厚积淀。它曾表现为对清王朝的忠顺，以求报效之途；又表现为对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的追随及毫不掩饰地揽权、争权、弄权。他在内战中败亡以后，失意中得蒋介石赏识，从此附翼而飞，唯蒋之命是听，为的是得到权力的荫庇和赐予；一旦有了适当的权力后，也希望跻身于更高层次的权力角逐中去，甚至不排除某些时候萌生觊觎最高统治权位的奢望。何应钦有一切权力崇拜者的共性——权势胁迫下的奴性，但他却又能从顺从与自主之间选择较适度的临界点。在攫取权力的路上，蒋介石企图当一名中国历史的驭手，而何应钦所极力争取的，只不过是当负载这驭手的千里马；蒋追求的是独裁者的至尊，何企求的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这一格局稍有破坏，矛盾便会爆发。

对于何蒋初结生死之交及尔后漫长时日的个性反差，并不是此前那些非历史的而又为人所熟知的概念化的东西所能说明。他为了投蒋所好，而使自己在年轻时暴露出来的某些会与之发生碰撞的性格压抑、变形、萎缩，而将那些为蒋所喜欢、与之能共处的个性加以发展、强化。何、蒋在反共问题是志同道合的。但在国民党内部，积极反共者未必都能与蒋相安无事。这便反证了何应钦有非同一般的扬长避短的自我设计和自制能力。

何应钦的主要军政生涯，几乎都是作为蒋介石的陪衬和得心应手的工具而存在。

在黄埔军校时期，蒋表现了娴熟狡诈的政治手腕，以左派出现的中间派的形象，同何应钦所表现的对政治的“迟钝”，或虽参与政治而故作四平八稳，配合默契。蒋善于用革命词藻哗众取宠，与何应钦的不擅辞令而长于“以身作则”的务实精神相得益彰。在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的关系上，蒋自恃富于思想、主义和理论，缺乏的恰是有人能身体力行，为学生和部下树立“知行合一”的领导形象。何应钦似乎补了些缺。

在尔后漫长的军政生涯中，何应钦好比国民党军的大管家。管家要善于对主子察颜观色，永远不能独行其是和喧宾夺主。这一点，一般说来，何应钦是做得比较好的。他还有一点是任何总管之类的角色所难以做到的，即不在主人周围培植自己的私党。这不仅博得蒋的放心、欢心，更能在大多数时候游离于国民党的派系漩涡之外；而真心党附他的人，也可以无被主子猜忌的后顾之忧。

何应钦之依附于蒋，得蒋信用，使他在国民党中央系与地方各派系的斗争中起了特殊作用。他既是国民党军中央系的第二号人物，却又不是江浙帮，与蒋无裙带瓜葛，而与川、滇、黔、湘、桂、粤这些曾同属西南军阀管垒的地方实力派却有历史渊源及广

泛联系。蒋之重用何，既可作为笼络非嫡系的招牌，还可驱使他在新军阀混战中火中取栗而又避兼异己之嫌。这是在蒋介石权力怪圈核心层人物中，别人所无法替代的。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以三代元戎、两朝老将的姿态，把对蒋介石的忠诚移之蒋经国身上，忠臣义仆是兼而有之。除了感情的延续外，仍是为“正统”信仰和权势名利所驱动。

何应钦对社会、官场的普遍适应性与他个人生活作风、个性品格之间的矛盾，如果机械地套用阶级分析方法，似乎这矛盾的提出本身就因矛盾对立而不能成立。

这对矛盾的表象，是受某些人推崇备至的他的处事待人之道和相对少有贪鄙的生活作风。他的严于克己的生活作风和某些深含儒家中和之道确实值得肯定的个性，既是何蒋关系的润滑剂，又是在权力角逐中不易成为众矢之的的护符。何应钦外在的坦率、诚挚和内心的深含不露、工于心计能相辅相成。他在官场上和政治斗争中的世故圆滑、狡诈虚伪，与他不大肆聚敛挥霍、洁身自守颇不协调。他没有恶习嗜好，但对周围的腐败蔓延、贿赂公行、狂嫖滥赌、巧取豪夺等现象虽有不满，却听之任之，有时还故意放纵，以免结怨。这种社会环境与他个人崇奉的道德原则的冲突十分激烈，他要真正坚持个人认可的道德原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为了自保并求得发展，他不能不表现出政治道德与生活道德的矛盾、对人对己矛盾的双重人格。他追随蒋介石反共起家，一切皆以反共利害为依归。在蒋介石面前，他优柔寡断，一味顺从逢迎，很少立异执言；即使追权逐势，只想巧取，不敢豪夺，故能侥幸避祸，保全禄位；而他对上谦恭，对左右和气，对朋友颇礼貌，对部下、学生均无架子，人缘颇好，亦得部下卖力。他办事缜密，工作勤奋，循章依矩，不越雷池。有时亦身先士卒，

能作表率。他追随蒋介石，“从一而终”。在CC派、复兴社、政学系之间，取超然之势，尽量回避冲撞。去台后，他对“大陆派”与“土著派”，亦双双结缘联谊。即使受到排挤，也能委曲求全，终能旋伏旋起，解怨释嫌，永享尊荣。他的“福将”之誉，“武甘草”之称，“何婆婆”之名，皆与上述个性特征有关。

如果说何应钦一生军政生涯的轨迹主要是反共亲日的话，那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在他完全投靠蒋介石从事反共反人民之前的30多年间，主宰他思想、行为和导致他走上反共道路的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因素是什么？它是怎样与一条主线、两对矛盾衔接吻合的呢？这是深入研究何应钦所必须探讨的。

在何应钦身上，确乎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传统文化的负效应。何应钦自幼就接受了儒家纲常名教、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濡染。留学日本期间，他对中国儒学、印度佛教与西方近代文明融合而成的大和文化中的儒学之根，产生了强烈的认同与敬仰。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创生、演变和挣扎衰落及当今的扬弃发掘的四阶段，其影响不可谓不深不大。何应钦青少年时代和军政生涯的黔军时期，正是清末民初传统儒家思想受到猛烈冲击而挣扎衰落的时代。他思想中既保留着传统儒学之根，但又兼收并蓄地接纳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他同所有在军阀割据混战时代的渔利者们一样，莫不高扬起民国“正统”的魂幡，把儒家的纲常名教与攫权造势同时摆进心中的祭坛。“五四”运动前后，可以在何应钦身上看出这种旧传统几乎被新潮流吞没的迹象。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根基既深且厚，精华者绝不会泯灭，糟粕者也不会轻易朽烂。何应钦正是从传统文化糟粕中初尝了权势之果的滋味，把富贵、宗族、独裁、虚伪、中和、袭故视为宦海争渡的方舟。但他也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把恭敬、勤勉、



忍耐、礼让、自律、洁身、养性等，作为待人处世、自我调适的内功。

进入黄埔军校以后，一方面，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君”、“臣”名分已经萌芽。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以后，俨然又以真传“正统”自居。忠君、正统观念和垂手可得的功利，使何应钦与蒋介石如胶似漆地粘结起来。另一方面，国共合作的形势、国民党中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斗争，关系复杂，矛盾重重，真伪难辨。在黔军时代有过从权势峰巅跌落隐痛的何应钦要避免重蹈覆辙，便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反共作为自己政治上平步青云的阶梯，把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自己在波涌云诡中不被伤害的护身符。中和之表、宽厚之貌、慎笃严谨，掩饰了他内心深处的一切，使他博取了上司的信任、同僚的友好、下属的尊敬，最终猎取了他梦寐以求的权势。虽然尔后何应钦皈依了基督教，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堕性犹如地心引力一样，使他无法摆脱。

中国传统文化的效应与一条反共的主线、两对矛盾的交织，便塑造了何应钦之为何应钦的特殊形象。

何应钦一生的主流、本质是可以盖棺论定了，但他留下的一一个个待解的悬案、一串串种豆得瓜的机遇、一系列以喜剧始以悲剧终的因果反复、一系列导致必然结局的偶然性以及他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具体作用及其评价等等，尚需进一步搜集资料，详加研究。

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今天，要提倡闯的精神，“冒”的精神，不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一定万无一失才去干的精神，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我在本书中所写的何应钦，所提出的一些学术见解，不实不对之处自然难免，但只要允许试验，允许改正，我就有机会，也一定能改过来。

熊宗仁